



鲁迅翻译思想研究

冯玉文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陕西理工学院学术著作出版基金、陕西理工学院2013年
校级人才启动项目（SLGQD13-39）资助出版



鲁迅翻译思想研究

冯玉文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鲁迅翻译思想研究/冯玉文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1
ISBN 978-7-5161-5218-8

I. ①鲁… II. ①冯… III. ①鲁迅(1881~1936)—文学翻译—研究
IV. ①I210.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97530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周晓慧

责任校对 周晓慧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8.5

插 页 2

字 数 313 千字

定 价 5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导论	(1)
第一章 鲁迅翻译的目的	(7)
第一节 以翻译“立人”的思想建构	(7)
一 “立人”思想的源流	(8)
二 “立人”中的“立国”	(13)
三 “立人”中的“我”与“他”	(16)
第二节 以翻译“立人”的实践路径	(20)
一 思想革命	(20)
二 文学建设	(24)
三 语言改造	(31)
第二章 鲁迅翻译取材的价值标准	(37)
第一节 取舍间的总体考量	(37)
一 拒绝暴力:对虚无党小说的放弃与《域外小说集》的 选材	(38)
二 取向真实:对苏联主流文学的淡漠与对“同路人”文学的 热衷	(44)
三 瞩目边缘:对经典的回避与对弱小民族文学的青睐	(55)
第二节 自由平等与博爱诉求	(59)
一 批判特权:倡导自由平等	(59)
二 弘扬博爱:无所不爱	(63)
三 祈望互爱:避免伤害	(65)

第三章 鲁迅翻译取材的国家、作家因素	(69)
第一节 国家选择中的自身定位	(69)
一 法、德、美、英:仰望中的启蒙诉求	(70)
二 西班牙、芬兰等弱小民族:寻觅同盟	(77)
三 俄、苏:“为人生”精神的契合	(84)
四 日本:失落中的华年之忆	(90)
第二节 作家选择中的困厄取向	(103)
一 盲、流亡、屡被放逐的爱罗先珂	(104)
二 “高山小民族”的巴罗哈	(111)
三 苦于现实的“同路人”	(116)
四 英年早逝的作家	(120)
第四章 鲁迅翻译的策略、方法	(129)
第一节 欧化策略的源流	(129)
一 欧化是一种文化取向	(130)
二 欧化翻译策略的形成	(137)
三 欧化与异化殊途同归	(143)
第二节 欧化策略中的硬译	(145)
一 硬译:从翻译精神到翻译方法	(145)
二 翻译论战中理性的消隐	(155)
三 “硬着头皮译”的回馈	(159)
第三节 欧化策略的实践特色	(162)
一 有限的硬性欧化	(162)
二 普遍的弹性欧化	(165)
三 儿童文学的“去欧化”	(169)
第五章 鲁迅翻译的路径、方式	(175)
第一节 转译:弊端与优势共存	(175)
一 转译的弊端	(176)
二 转译的发生	(180)
三 转译的开拓性	(184)

第二节 复译的必要性	(187)
一 “非有复译不可”	(188)
二 复译的观念迷障	(189)
三 理论与现实的抵牾	(192)
第六章 鲁迅翻译的预想读者	(195)
第一节 预想读者的指向	(195)
一 自我改造	(195)
二 儿童教育	(202)
三 民众启蒙	(207)
第二节 预想读者的疏离	(214)
一 与大众读者的隔膜	(214)
二 对精英读者的期待	(217)
三 “分层次”读者的设想	(222)
结语	(227)
附录一 鲁迅翻译作品国别统计表	(229)
附录二 鲁迅对中国翻译事业的贡献	(243)
附录三 鲁迅翻译研究成果述评	(266)
参考文献	(286)
后记	(291)

导 论

学术界的鲁迅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从20世纪最初10年的末期开始萌芽，到20—30年代滥觞和初步发展，经40年代的高峰，又经历以后的递进、挫折、复苏、开拓，至今已近一个世纪。在这一长时期的发展过程中，鲁迅研究的论著，从未间断过发表与出版。”^① 鲁迅研究、鲁迅研究的再研究，甚至再研究的研究都已是成果丰硕，建立“鲁迅学”学科的讨论也已历经数十个春秋。然而，在鲁迅研究成为显学之后，鲁迅翻译的研究却长期处于被冷落的状态：鲁迅翻译思想、翻译作品，尤其是译事系统的整体观照，成为鲁迅研究非常薄弱的环节。1983年，在汇聚学者关于鲁迅研究成果的《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中，还难觅“专题性”鲁迅翻译研究的踪影^②；2001年出版的彭安定的《鲁迅学导论》终于有专章论述“鲁迅的接受世界（国外）与翻译文本研究”，并且认为：“把鲁迅的翻译，纳入到译介学和翻译学的框架中，可以研究的方面很多。”^③ 之后广东教育出版社的张梦阳编《中国鲁迅学通史》虽堪称鸿篇巨制，但并没有在“索引”中明确谈到翻译文学研究。可以说，直到近十多年才真正开启了鲁迅翻译研究的篇章。但直到鲁迅研究已经深入方方面面的今天，其翻译研究依然滞后。

研究界对于鲁迅翻译的冷淡态度，与鲁迅本人对于翻译的热情呈现出明显的不对等状态。鲁迅对翻译非常重视，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鲁迅的工作时间，以他一生中用在著作方面的时间来说，一半以上用于介绍外

① 彭安定：《鲁迅学导论·绪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②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编辑《1913—1983 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1990年版。

③ 彭安定：《鲁迅学导论·绪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36页。

国文学和学术性的著述上,其余一半才用于创作上。”^①孙郁也认为,研究鲁迅“要先看他的译作,再读他的作品。鲁迅首先是个翻译家,其次才是个作家。他一生的工作,把译书看成主业,译介之余,才有了创作”^②。以鲁迅对翻译用力之勤,足可以翻译家相称,但由于机缘不巧,他的这一想法没有得到彻底实现:生前没有人认为他是翻译家,身后也没有成为一个纯粹的翻译家——至少,他翻译家的身份,长时间被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的论断所遮蔽。但不可否认的是,鲁迅的翻译活动贯穿其生命的始终,他的文学之路始于翻译,终于翻译:“鲁迅的文学事业,是从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开始的。他决定弃医学文,提倡文艺运动来唤醒人民的觉悟,就是受到外国文学的启发的。从1907年写《摩罗诗力说》直到逝世以前他翻译果戈理的《死魂灵》,三十年间他从未停止过翻译和介绍的工作。”^③鲁迅一生共翻译了16个国家^④200多种作品,“至于他在创作、书信、日记中涉及的外国作家作品就更多,大约有25个国家和民族的380位作家”^⑤。数量之巨,涉猎之广,实属罕见。鲁迅不止自己翻译,还帮助很多青年走上翻译道路,出版翻译丛书,创办翻译杂志,在当时的翻译界非常活跃。鲁迅“对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是中国现代译介外国文学的开拓者……他在译介弱小民族文学和俄罗斯文学方面,在介绍欧洲新文艺方面,在建立翻译文学与中国新文学的有机联系方面,在继承我国翻译传统和理论方面,在培养和组织翻译人才方面,都是一位突出的先驱者”^⑥。

虽然鲁迅为翻译工作呕心沥血,虽然鲁迅翻译的作品在数量和质量上

① 《冯雪峰忆鲁迅》,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43页。

② 孙郁:《鲁迅书影录》,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86页。

③ 王瑶:《论鲁迅作品与外国文学的关系》,《王瑶全集》(6),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04页。

④ 由于统计的时间、来源或统计者观念的差异,这一数据有所不同,分别为14、15或16个国家。例如,谢天振、查明建的《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1898—1949)与刘绍勤的《盗火者的足迹和心迹》等统计为14个国家,而戈宝权的《中外文学因缘——戈宝权比较文学论文集》与顾钧的《鲁迅翻译研究》等统计为15个国家。笔者统计为德、法、美、英、西班牙、荷兰、奥地利、芬兰、匈牙利、波兰、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捷克、日、俄、苏共16个国家,请参见本书附录一。

⑤ 谢天振、查明建:《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1898—1949)》,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82页。

⑥ 同上书,第85页。

都相当可观,虽然鲁迅培养和影响了众多翻译家,虽然翻译和创作是统一的整体,虽然鲁迅的创作已经得到研究界和读者的高度认可,虽然……但是,对鲁迅翻译的研究在很长时间里都没有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其原因何在呢?第一,从技术操作上来看,翻译相对于创作的研究难度明显增加:要涉及原语作者和作品、原语到目的语的语言转换规则及译作与原作对比、翻译策略及翻译方法的确定与阐释诸多问题。第二,鲁迅所采用的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无形中造成其译作的曲高和寡:研究者与读者同样因犯难而回避。第三,鲁迅的翻译作品,如“同路人”文学以及部分日本文学所体现的思想与已经被人为定性的鲁迅思想存在些许悖谬之处,也使研究者感到无所适从。第四,鲁迅翻译作品中的很大部分是俄语文学与文论^①,这又难免受到意识形态乃至中俄(苏)邦交的影响。第五,学理范围内注重创作而轻视翻译的“重处子轻媒婆”思想^②在作祟。虽然历史上某阶段翻译的地位曾经得到提升,但是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难以清除。

无论过去经历了多少冷落,鲁迅翻译研究也已经越来越引起学界的重视。传统翻译理论一直认为翻译只是语言转换的问题,译者应当在翻译过程中“隐形”。随着翻译理论的深化,现代翻译理论开始关注翻译活动的实施者——翻译主体。译者是翻译活动的真正主导,是整个翻译链条上最活跃、最富于变化的因子:原作要经过译者才能够成为译作,才能够为读者所热捧或者受其冷落,从对于原作的选择到翻译策略、方法的运用,再到翻译过程中克服各种阻碍因素,甚至读者对译作的接受等,都是在译者的设想和操控之下得以完成的。简而言之,翻译活动是在译者翻译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的,译者的整个翻译系统都统摄于译者的翻译思想之中,因此,对译者翻译思想的研究是翻译研究的关键所在。鲁迅的翻译目的、翻

① 惯常的说法应是“俄苏文学与文论”,但该说法包括了很多俄国(或苏联)的侨民文学、回归文学、流亡文学、境外文学、解冻文学等概念,也包括了使用少数民族语言的创作和使用侨居国、流亡国语言的创作。对于中国翻译的俄苏文学和文论而言,准确而具有涵盖性的描述应为“俄语文学与文论”——强调其原作为俄语文本。为了避免由于概念内涵或外延模糊而可能引起的混乱以及考察、论述的方便,本书引入了“俄语文学与文论”及相关概念。

② 持这一思想的代表性人物是郭沫若。1920年12月12日,郭沫若在给李石岑的信中说:“……我觉得国内人士只注重媒婆,而不注重处子;只注重翻译,而不注重产生……处女应当尊重,媒婆应当稍加遏抑。”原本在私人信件中谈及此事属于一己之见的抒发,可在1921年1月15日《时事新报·学灯》发表了该信之后,翻译者的地位和作用就成为学者们尤其是译者们公开讨论的话题。

译取材、翻译策略、翻译方法、翻译路径、翻译方式等,都非常具有先锋性和前瞻性。在鲁迅翻译思想的统摄下进行鲁迅翻译的研究,理应是鲁迅研究不可或缺的部分。

第一,鲁迅为什么翻译?也就是翻译目的问题。翻译目的决定着翻译选材和翻译操作的策略、方法等,是整个翻译系统得以形成的动因,是鲁迅从事翻译活动、成为翻译家的原因。鲁迅在日本留学时期,深深为中国的积贫积弱、民众的愚昧麻木所困扰,又因为信奉“人立而后凡事举”,从而形成了“立人”思想。“立人”思想中包含着“立国”的诉求,但鲁迅最终关注的还是国民思想的建设,希望人人都成为独立自由、平等博爱的“超人”。如何实践“立人”?当然是采用思想革命来改变国民的精神,而改变精神的方式“首推文艺”,这就需要文艺建设。但文艺对于“十之九不识字”的国民来说难以产生效果,让国民摆脱文盲的状态又成为首要问题,这就需要给民众创造出新的、容易掌握的、言文一致的语言文字。“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鲁迅竭力通过翻译从异域“拿来”——不但拿来新思想,拿来新文艺,还进行了拿来新语言的尝试。在鲁迅整个翻译系统中,“立人”的翻译目的处于核心地位,它决定翻译选材、翻译的策略和方法等。表面看来,鲁迅的翻译目的有不同的指向:思想改造、文学建设或者语言变革;然而深入考察就会发现:无论是思想改造还是文学建设、语言变革,最终又都指向“立人”的诉求。

第二,鲁迅翻译了什么?也就是翻译取材问题。鲁迅翻译的取材思想与当时中国在世界上的弱国地位、鲁迅自身弱国子民的处境密切相关。虽然选材问题最终指向的是作品,但是考察鲁迅的译事活动会发现:作品的来源国家和原作者也常常是鲁迅选材考虑的重要因素。因此,笔者从作品、国家、作家三个角度阐释鲁迅的翻译选材思想。在作品的选择方面,鲁迅表现出强烈的翻译主体意识:拒绝暴力、取向真实、瞩目边缘;选材中还承载着鲁迅的平等与博爱诉求。在翻译取材来源国家中,法、德、英、美等强国的取材起步于“翻译救国”的热潮,但其根基却是思想启蒙;西班牙、芬兰等9个弱小民族、国家的取材源于鲁迅对与自己同等处境国家、民族的关注,是同盟的寻觅;俄国、苏联的取材最贴近鲁迅的精神实质,无论是帝国主义的俄国还是社会主义的苏联,鲁迅关注的只有一个:“为人生”;日本的取材与鲁迅的留学经历和对日本的情感密切相关,

7年留日生活后，鲁迅以翻译日本作品作为对自己青春岁月的追忆，体现了对日本情感的皈依。在作家选择中，鲁迅特别看重处于困厄处境的作家，笔者以两个作家和两个群体作为论述的对象：一是眼盲、流亡、屡被放逐的俄国诗人爱罗先珂，鲁迅翻译了他的14部童话作品；二是来自西班牙“高山小民族”的巴罗哈，这是鲁迅唯一关注的西班牙作家，翻译了他8篇作品；三是倡导真实、揭露现实又困顿于现实的苏联“同路人”作家群体，鲁迅为他们编译文集《竖琴》，对该团体和作家作了反复介绍，一再关注他们悲惨的遭遇；四是鲁迅译文副文本形成的英年早逝作家群体，鲁迅总是对一些短命的作家青睐有加，体现出鲁迅对于先觉者生命价值的独特思考。

第三，鲁迅怎样翻译？也就是翻译策略和方法等问题。翻译策略决定翻译方法，翻译方法是翻译策略的具体实践方式。鲁迅采用欧化的翻译策略是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中消极因素的否定和对域外先进文化的向往，所以说，欧化是一种文化取向。鲁迅的欧化策略既有中、日两国历史的依据也有现实的需求。鲁迅的翻译方法主要以直译为主，但是由于鲁迅对“硬译”的强调以及“硬译”论争的广泛影响，“硬译”成为鲁迅翻译方法的代名词。追踪“硬译”的来源会发现：“硬译”是在论争氛围中完成了从翻译精神到翻译方法的转变；论争中所谓的“信”与“顺”之争其实针对的多是对方的翻译错误；鲁迅所坚持的“硬译”不但读者不买账，就是鲁迅自己也深受其害：西语与汉语的形式对等根本无法实践。从鲁迅的译文考察鲁迅的欧化策略可以发现：他所主张的将欧式文法硬性运用于汉语语言的“按板规逐句，甚而至于逐字译”的所谓“硬译”很少，而普遍采用的是“力求其易解又要保存着原作的风姿”的弹性欧化——直译方法，甚至在儿童作品翻译中，努力进行“去欧化”处理，不惜采用意译方法。鲁迅的转译和复译思想也是鲁迅翻译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转译是对译者掌握语言和译者所译文本语言差异的无奈调和，也是鲁迅急于输入异域文化的急切表现；鲁迅清楚转译的种种弊端，更深知转译所具有的开拓性、可塑性和时效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其弊端进行弥补和矫正。鲁迅认为复译十分必要：译本从无到有、从不好到好都有一个过程，译本不好就“来一回复译，还不行，就再来一回”，这种思想在理论上成立，但是在当时信息流通并不畅通的情境下，在翻译实践中的可行性被淡

化和部分消解。

第四，鲁迅为谁翻译？即译作的预想读者问题。翻译目的决定翻译策略，也确定译作的预想读者。鲁迅的翻译目的体现了对愚昧的弱国子民的启蒙诉求。鲁迅希望通过翻译“别求新声于异邦”：实现国人的思想改造，催生自立自强、科学理性、平等博爱的新人。哪些人可能成为新人？其一是作为启蒙者的自我，“必须先改造了自己，再改造社会，改造世界”。其二是代表未来主宰又容易接受新思想的儿童。其三是实现大众的改造。在鲁迅的观念里，普通民众识字的很少，所以鲁迅设定自己译作读者的时候，常常给出的是精英阶层。鲁迅采用的欧化策略所凸显的异域因子自然会造成大众读者的疏离，而鲁迅译作的理想读者也的确并非普通民众，但鲁迅并不是没有为大众设想，他拟将大众读者进行“分层次”处理，再按照不同层次供给相应的读物。

第五，鲁迅究竟翻译了哪些国家哪些作家的哪些作品？为了有一个系统而且直观的认识，本书附录一将鲁迅所有单篇翻译作品做国别分类，再以表格的形式将相关信息加以规范展示。附录二要说明的是，鲁迅不但自己身体力行地进行翻译，还为中国翻译事业的发展鞠躬尽瘁，这体现在鲁迅不仅组织翻译团队，创办翻译刊物，而且培养了众多翻译人才；因这部分主要以鲁迅实践性较强的翻译活动进行论证，所以笔者将其以附录的形式加以呈现。附录三是笔者对鲁迅翻译相关研究成果进行的梳理，前辈的思考和积累，是本书得以问世的重要前提。

鲁迅的翻译思想指导着鲁迅的翻译实践，同时，鲁迅的翻译实践也印证、检验和完善了鲁迅的翻译思想。“立人”是思想家、文学家鲁迅的思想基础，更是翻译家鲁迅的终极诉求。要厘清这一点，需要对鲁迅的翻译思想进行全面的梳理和整合。总体上看，鲁迅翻译思想高屋建瓴、复杂精深，在当时和现在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指导意义。

第一章

鲁迅翻译的目的

鲁迅为什么翻译？这是鲁迅翻译的目的问题，也是一个处于鲁迅翻译系统核心位置的问题——翻译目的决定翻译操作的策略、方法和路径。

在“西学东渐”的文化背景下，借助对西方文化广收博采的日本平台，鲁迅参照各国文化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了认真审视，采取了怀疑、批判、建设的态度。在中国，闭关自守造成了国家的封闭落后，专制统治导致了民众的愚昧麻木。要改变这样的状况，只有借助外来文化的力量，也就是“别求新声于异邦”^①；又因为鲁迅认为“文艺是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所以“便自然而然地想到介绍外国文学这一件事”^②。鲁迅一生都在向中国输入异域文化，因为“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③，鲁迅祈望借助外来文化的洗礼来实现中国人的新生——由“愚弱的国民”^④转变成为思想自由、人格独立、个性解放的人，这就是鲁迅以翻译“立人”的思想，他坚信“人立而后凡事举”^⑤。

第一节 以翻译“立人”的思想建构

面对麻木、愚昧的国民，鲁迅终生致力于对人的思想改造和建设事

① 鲁迅：《坟·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1），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5页。

② 鲁迅：《译文序跋集·域外小说集·序》，《鲁迅全集》（10），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61页。

③ 鲁迅：《且介亭杂文·拿来主义》，《鲁迅全集》（6），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0页。

④ 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1），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17页。

⑤ 鲁迅：《坟·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1），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7页。

业，创作如此，翻译亦如此。在思想建设层面，鲁迅主张“首在立人”^①，也就是将“个人”思想的建设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上，这与五四时期“人的发现”的大环境相关，更与鲁迅自身的经历相关。“立人”思想本就与来自异域的个人本位观念密不可分，鲁迅借助文学翻译将其发扬光大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因为鲁迅翻译发生在积贫积弱的现代中国，所以其翻译目的曾经以国家的强大为终点，但是鲁迅很快就发现，只要人的精神强大，自由、平等、博爱等思想深入人心，国家自然会富强起来。所以，鲁迅翻译经过了“立国”诉求的短暂高蹈，最终又指向芸芸众生的生命体验和生存状态。在社会关系中，鲁迅希求通过“立人”实现一个理想化的境界：用“互爱”来主导一切。

一 “立人”思想的源流

“人的发现”在五四时期乃至现代中国都不啻一声惊雷，使原本只处于国家、社会、家庭的固有秩序、按照固有规律生活的人们开始认真审视自我、发现自我。个人主义、个性主义、个体主义、人道主义等思潮伴随着个性解放、平等、自由、博爱等名词纷至沓来，使人们认识到解放个人、张扬个性、发挥个体价值的重要性，将人从麻木被动的生存状态转化为积极主动的生存状态，是社会进步的根本，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价值所在。当时，周作人、胡适、陈独秀等人针对这一问题也都有精彩的论述，可以说，这是很多现代知识分子共同关注过的问题。

鲁迅对国人精神层面的关注至少在决定学习医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一方面为了“救治象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另一方面是想“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因为鲁迅知道“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②——医学可以对人的身体和精神进行双重疗救。据许寿裳回忆，1904年以前，鲁迅曾对他谈到三个与人的精神建设相关的问题：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的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它的病根何在？可见，鲁迅后来的“弃医从文”绝非“幻灯片事件”所导致的一时冲动，这种“自然科学向社会科学的转变”“科学向

① 鲁迅：《坟·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1），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7页。

② 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1），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16页。

‘人’学的转变”^①并不突兀，而是有着非常深厚的思想基础的。鲁迅“看待所有近代思想的着眼点，与其说是这些思想所提供的结果，倒不如说是接受这些思想的主体和创造这些思想的人的精神内部。即使对待‘科学’也是如此”^②。也就是说，鲁迅的“弃医从文”是自然而然的选择，因为在“医”与“文”中恒定着的都是鲁迅对中国国民“疗救”的诉求。

鲁迅在留学日本期间，正是尼采哲学在日本盛行之时。现代中国趋新求变的整体社会氛围与尼采的超人哲学、反抗精神、重估一切价值等思想相契合，因而受到当时智识阶层的追捧，如1904年王国维就曾指出尼采“以强烈之意见而辅以极伟大之智力，其高瞻远瞩于精神界”^③。鲁迅第一次谈到尼采是在1907年发表的《摩罗诗力说》中，鲁迅用尼采的话作为开篇：“求古源尽者将求方来之泉，将求新源。嗟我昆弟，新生之作，新泉之涌于渊深，其非远矣。”^④在文中又两处写到尼采，一处指出尼采认为：“文明之朕，固孕于蛮荒……蛮野如蕾，文明如实”；另一处则阐明：“尼耙欲自强，而并颂强者；此则亦欲自强，而力抗强者。”^⑤对于蛮野的赞赏可以理解成对于人类本性的期待，而对于强者的赞赏则激励着弱者自强。在《文化偏至论》中，鲁迅认为，尼采是“个人主义之至雄桀者矣，希望所寄，惟在大士天才”，并且谈到：

如尼耙伊勃生诸人，皆据其所信，力抗时俗，示主观倾向之极致；而契开迦尔则谓真理准则，独在主观，惟主观性，即为真理，至凡有道德行为，亦可弗问客观之结果若何，而一任主观之善恶为判断焉。其说出世，和者日多，于是思潮为之更张，骛外者渐转而趣内，渊思冥想之风作，自省抒情之意苏，去现实物质与自然之樊，以就其本有心灵之域；知精神现象实人类生活之极颠，非发挥其辉光，于人

① 方长安：《鲁迅立人思想与日本文化》（上），《鲁迅研究月刊》2002年第4期。

② [日]伊藤虎丸：《鲁迅与日本人》，李冬木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68页。

③ 王国维：《叔本华与尼采》，《王国维论学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66页。

④ 鲁迅：《坟·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1），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3页。

⑤ 同上书，第78页。

生为无当；而张大个人之人格，又人生之第一义也。^①

鲁迅所介绍的尼采思想——自强理性、趋新抗俗、张扬个性，这正是当时极力摆脱麻木愚昧的中国人所需要的精神元素。虽然当时很多有识之士对尼采思想给予认可，但几乎都是零散甚至片面的解读，并没有系统的原作呈现。到1918年，鲁迅用文言翻译了《察罗堵斯德罗绪言》中的三段，但并没有发表。两年后，鲁迅用白话再次翻译这一作品，名为《察拉图斯忒拉的序言》，而且扩展到十段，发表在《新潮》杂志上。尼采的《察拉图斯忒拉的序言》是鲁迅一生中唯一一部分别用文言和白话翻译的作品，足见鲁迅对于该作品的重视程度，也显示出鲁迅将其介绍给国人的决心。该译作几乎是中国最早的相对完整的尼采作品翻译，直到1928年，尼采作品的译作也“只有半部”^②，这半部就是郭沫若翻译的《查拉图司屈拉钞》的第一部分。可见，鲁迅比同时代人更早地认识到了尼采的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鲁迅选取译介的只是尼采这位“个人主义之至雄桀者”^③ 庞大学说体系的一个部分，毋庸置疑，这部分恰恰是国人所需要的，也是鲁迅“立人”思想的重要来源和组成部分。刘半农曾说鲁迅是“托尼学说，魏晋文章”，可见鲁迅从尼采处获益匪浅。鲁迅当然认识到尼采思想的问题所在，例如：

尼采又是咒诅女人的名人。^④

尼采就自诩过他是太阳，光热无穷，只是给与，不想取得。然而尼采究竟不是太阳，他发了疯。^⑤

但后起的《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却比

① 鲁迅：《坟·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1），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4页。

② 鲁迅：《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鲁迅全集》（4），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11页。

③ 鲁迅：《坟·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1），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2页。

④ 鲁迅：《华盖集续编·有趣的消息》，《鲁迅全集》（3），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99页。

⑤ 鲁迅：《且介亭杂文·拿来主义》，《鲁迅全集》（6），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8页。

果戈理的忧愤深广，也不如尼采的超人的渺茫。^①

也正因此，除此篇之外，鲁迅再没有翻译过尼采的作品。鲁迅对尼采学说的取舍是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拿来主义”的有益实践。

除尼采外，《摩罗诗力说》中摩罗诗人义无反顾、为民请命的反抗精神也为鲁迅所赏识：“无不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随顺旧俗；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② 这成为尼采之外鲁迅“立人”学说的又一思想源泉。

鲁迅正式谈到“个人”的问题最早见于1907年的《文化偏至论》：

个人一语，入中国未三四年，号称识时之士，多引以为大诟，苟被其谥，与民贼同。意者未遑深知明察，而迷误为害人利己之义也欤？夷考其实，至不然矣。而十九世纪末之重个人，则吊诡殊恒，尤不能与往者比论。试案尔时人性，莫不绝异其前，入于自识，趣于我执，刚愎主己，于庸俗无所顾忌。^③

这里，鲁迅首先指出了人们对“个人”提法的误解。“个人”的概念最初进入中国的时候，因为强调个人，其字面的意思和中国原有的自私自利似有相似之处，的确引起了很多误解。直到五四之后，胡适介绍易卜生的个人主义思想“救出自己”时，仍然引起人们的批评。胡适只好用孟子的精神来化解：“孟轲说‘穷则独善其身’，这便是易卜生所说‘救出自己’的意思。这种‘为我主义’，其实是最有价值的利人主义。”^④ 也就是将自己铸造成器，这样方有益于他人和社会。关于这点，鲁迅也早有见地，虽然表达得不如胡适明确：“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⑤ 鲁迅一直不用“个人主义”一词来阐释个性解放、个体权利和

① 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6），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39页。

② 鲁迅：《坟·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1），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99页。

③ 鲁迅：《坟·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1），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0页。

④ 胡适：《易卜生主义》，《胡适文集》（2），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9页。

⑤ 鲁迅：《坟·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1），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6页。